

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

何雪松

内容提要 社会工作在中国正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其不仅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也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对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存在较高期待。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社会工作缺乏强劲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是呼应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实践的需要,是超越现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要求,是寻求“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是回应全球经济社会变迁的全新挑战。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源头。

关键词 社会工作 实践智慧 科学研究 本土思想 制度传统

社会工作在中国正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自从“社会工作”一词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之后,其地位有了明显提升。这是因为,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的很多社会创新是围绕社会工作展开的。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对这一专业或职业有着较高的期待。然而,要真正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就必须要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否则很容易各行其是,导致一盘散沙,缺乏明确的结构、逻辑和路径。套用亚历山大的话,“没有强劲的社会学理论,就没有强劲的社会学”^①,笔者相信没有强劲的社会工作理论,也就没有强劲的社会工作。在此背景下,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是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迈向”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是:目标明确,步伐坚定。也就是说,专业共同体一定要以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为学术目标,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回避这一重任。

为什么要有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勾勒出建构中国的社会

工作理论的理论与现实背景,这个背景不能只是聚焦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而且要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中进行理解。基于这一立场,本文认为,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的必要性源于以下四点认识:

1. 这是呼应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实践的需要

中央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标志着社会工作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也为社会工作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是近年来社会工作的发展对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现实,这导致“所学”与“所用”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一旦进入一线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常常需要从头开始,有着较长的适应与知识再造过程。因此,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呼声很高,专业共同体必须有所作为,否则社会工作的专业成长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

其次,中国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远远超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视野所及,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这

样的宏大叙事进行关联,需要新的理论视野。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难从现有的西方理论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思想支持。相反,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宏大议题上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创见,对全球专业共同体将是一个重大贡献,也弥补了现有社会工作理论宏观视野之缺失。

最后,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面临很多理论议题,诸如如何确定中国语境下社工与案主的专业界限,如何在专业性与政府的期望之间实现平衡,如何处理广义的“社会工作”与专业的“社会工作”之间的关联。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政府和实务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但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从现有的文献之中寻求答案。

由是观之,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强化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建设的关键作用,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2. 这是超越现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要求

即便是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专家也认识到,社会工作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其价值观具有犹太教或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不能随意运用,原因有三:其一,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可能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前提和要求发生冲突;其二,各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情况不同,因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适应性就存疑;其三,存在文化帝国主义和压迫性殖民主义的担忧,这可能是对本土文化和体系的破坏。^②不难看出,此种判断的立论基础是基于文化多元主义或文化差异的认识。

实际上,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就其本身而言,至少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现有的理论体系过于微观导向,宏观视角较为缺乏。在20世纪60年代社区组织风靡一时之后,以改变社区、组织或政策为目标的宏观社会工作迅速衰落,社会工作的主要关注点再次定格为以个人为中心,临床社会工作盛极一时。美国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更是乐意在私人执业机构从事心理咨询服务,这无疑对社会工作的宗旨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学者发出“我们失去了神圣的目标”之警示,这直接导致宏观社会工作理论进展缓慢。如此倾向促使社会工作者去反思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专业宗旨,回到“社会”的呼声顺势而出。另一方面,原创性理论

较少,借用的理论较多。社会工作主要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而社会工作因为涉及的领域太广、面对的问题太多,因此尚未形成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整合性框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代表的融合框架只是说明性的,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地位。

因此,无论是为了回应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抑或是挑战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本身的不足,中国的社会工作研究者都有必要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上向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迈进,从而为中国的社会工作确立实质性的理论基础。

3. 这是寻求“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

正如曹锦清所指出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对西方“仰视”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中西“平视”,即平等对话的阶段,因此需要从“以西方为中心”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③中国的经验的确很难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得到全部解释,因此需要建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许,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理论自觉。

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我们无疑必须学习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这是不可或缺的阶段。但需要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警惕西方概念或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经验或实践采取霸权主义的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国专业共同体的失语状态。西方理论可以成为中国经验或社会工作实践的参照体系,但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不应被贬低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简单应用或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文化敏感性的一个注释。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自己的理论,即“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解读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并由此提炼出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

笔者认为,不仅如此,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还需要有全球关怀,在全球化脉络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④这需要在“以中国为方法”的基础上进展到“以全球为目的”,从中国式的“天下观”中获得思想支持。也就是如毛泽东所言,要“以中国

为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这样,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从而为全球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智识支持。

4. 这是对全球经济社会变迁的全新挑战的回应

全球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动,诸如金融风暴、欧债危机、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都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现有的社会建制,包括主流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似乎未能起到引领社会的功能,究其原因,社会工作尚未充分认识到全球经济社会变动的深刻后果,也未能及时在理论上有所回应,在实践上更是茫然毫无方向。社会工作不可能抽离这样的社会脉络,甚至在财政紧缩政策的冲击下,社会工作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迄今为止,社会工作对此显然在知识和理论建构上准备不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必须在理论上回应全球社会面临的宏大议题,并提出生产性、发展性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这个专业或职业才能可持续发展并引领社会走向公平与正义。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沟口雄三指出“批判世界经济发展之中的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抵制利己的和追求利润的原理,以及如何把中国思想中形成深厚传统而蕴积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而揭示于世界人类。”^⑤中国有着不同的思想传统,因此有可能为全球经济社会变迁提供不同的答案并落实到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网络社会的兴起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网络论坛、微博、博客成为公共议题讨论的重要平台,甚至出现了全球范围内较为罕见的火爆局面。社会工作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新兴媒介传递价值观、输送专业服务、倡导合理的社会政策,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厘清,并需要慢慢摸索形成一套基于虚拟社会的实践理论和服务模式,这无疑是对现有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拓展。唯有如此,社会工作才能更好地适应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者说,我们需要面向“新”的社会的工作,这毫无疑问需要全新的理论基础。

如何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

洞见到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的必要性之后,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本文认为,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前提,它们可能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点。而只有从基点出发,才可能建构社会工作的理论大厦。

1. 实践智慧

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各种形式的极端现代主义已经以“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观点代替了科学知识和实践智慧之间宝贵的写作,“在好的情况下,科学知识认为实践知识是不重要的,在坏的情况下,则认为实践知识是危险的迷信”^⑥。消灭实践智慧往往变成了专业知识或科学知识的使命,并且是以科学或专业化的名义展开的。这显示其后隐匿的是专家及其机构争夺制度霸权的政治斗争,因为福柯从来就主张知识就是权力,争夺知识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就是获得和践行权力的重要合法性基础。尽管社会工作中证据为本的实践尝试退缩其立场,愿意在证据的名单里加入临床工作者的实践智慧和服务使用者的反馈,但它们始终处于证据层次的最下端,这是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褊狭所在。

斯科特尝试以“米特斯”这一概念来指称实践智慧,因为这一概念是将“蕴含于地方经验中的各种知识形式与国家及其机构所使用的更一般的和抽象的知识进行比较的手段”^⑦。这个概念包括了人们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的过程之中所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如此知识的特点是不可言传和经验,这表明将其简单化为可以通过书本学习获得的演绎规律很困难,因为它起作用的方式非常复杂且不可重复,不能应用于任何正式的理性决策,也很难进行量表测量。实践智慧没有任何公式,而科学知识却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学会。认识到实践智慧对建构理论的重要意义是必要的,因此在笔者看来,这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而西方的理论体系往往容易忽视实践智慧。

重视从实践中获得认识是中国的智识传统,

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这样我们就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⑧实践智慧之中就蕴藏了很多这样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让生活本身,经验本身,让民间话语本身获得一种对输入的话语及理论对抗的权利。然后根据它,我们来修正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些现象”^⑨。在笔者看来,从经验本身衍生出的实践智慧,甚至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一个源头,而从这个源头导出的理论一定是扎根于中国现实的。

2. 科学研究

社会工作为了确立自己的专业地位和建构自己的专业理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贡献和理论建构,科学研究的意义在此就至关重要。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工学院相继建立研究中心以整合学术资源、提升研究水平,不少研究中心更是获得了来自政府和民间基金的大量资助。社会工作的研究(尤其是实践为本的研究)水平得以提高并且回击了外界对社会工作缺乏学术性的质疑。

从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角度而言,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经由科学研究去修订和完善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从而将这样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对的实务、政策和管理问题,从而提炼出理论议题,并探究理论议题之间的关联,从而形成体系或框架。

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科学研究的能力还较弱,坊间的很多论文还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更是缺乏必要的理论关怀。笔者认为,这一局面必须扭转,社会工作者不能重复研究不是问题的问题,而要真正致力于累积专业知识,循着科学研究的逻辑为理论的建构提供知识源头。

3. 本土思想

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脉络,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是那些深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下的思想模式。它是中国社会工作的构成性因素,在社会工作的

实践环节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引进”的社会工作理论,因此一线实务工作者迫切需要更加贴近中国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而这样的理论离不开本土思想资源的支撑——正如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离不开其古典思想传统。沟口雄三指出,需要“再度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层的传统中所蕴藏的中国的原理,从而面向为回答21世纪的课题构筑新的原理”^⑩。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的可行路径之一就是本土思想资源中寻求智慧,其目标不在于重申国粹,而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寻求一个可与国际同行对话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体系。在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之前需要考察本土思想资源与社会工作的相关性。中国传统中从来就不缺乏关于如何助人,如何化解生活困境,如何践行关爱、慈善和福利的论述,这些都是社会工作理论的聚焦所在。有必要指出的是,此处思想资源不仅仅包括思想家的论述,而且也包括流行于民间的思想观念,因为精英群体的思想只有渗透到民间的“小传统”之中才可以有坚实的根基。社会工作要明确关注民众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因为社会工作面对的正是这样的群体。检视社会工作的本土思想资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可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智识支持;它也会为反思华人社会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框架;从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可能为建构一个本土性和世界性兼有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提供基础。

4. 制度传统

尽管社会工作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和职业,但不能忽视中国过去六十多年历史实践之中蕴含着的与社会工作有着密切关联的制度传统。诸如群众工作、对口支援这样的制度实践已形成一套理念、机制和方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进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

略举几例。中国农村过去的“赤脚医生”制度,就很好利用了社区人力资源,本地的“赤脚医生”使得医疗服务的提供在地化和可接近成为可能。即便从现代的观点而言,这可能也是中国农

村最为有效的服务提供方式之一。今天的农村社会工作依然可以从培养本地的人力资源入手,从而化解科层制和外部输入带来的很多困扰。又如,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确立的调查研究传统影响也很深远,中国社会工作机构的一线社工也进行课题研究,这在国际社会工作界并不多见,这样的研究尽管从学院派的角度来看是不严谨的,但也可能提出很多好的洞见,且是最贴近实践或案主的创见。再如,尽管学术界常说,民政工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但实际上,这个特色是什么,没有对之进行很好的总结,这里面也许可以挖掘出很多有意义的命题。

过去我们为了引进“新”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可能忽视了中国自身制度传统之中的经验,没有对之很好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反而认为需要取而代之。但实际上,任何制度传统都有可能导导致“路径依赖”,因为民众和政府可能习惯于以特定的方式处理相应的事宜,而这个特定的方式是可资改进并加以利用的。本文认为,社会工作要推动激进改变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善用这样的传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甚至可能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起点。

简短的结语

即便目标明确,步伐坚定,但要真正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尚需时日,因为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甚至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不过,唯有我们真正自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从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这四个维度去努力,才能真正建立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并非要排斥现有的西方理论,而是说要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去面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所有构成性要素,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推进知识

的积累和体系的完善。循着这样的理论自觉,立足于中国社会,这个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相信在未来的10~20年,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将会有所突破。这一判断是基于专业共同体的理论自觉、中国的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多样化经验以及与国际同行的广泛交流。如果我们在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上有所建树,就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可以为国际同行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参考框架,从而为全球社会工作知识库存添加中国的贡献。相信这是专业共同体愿意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本文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社会学”(项目号:B501)和上海市曙光学者科研项目“社会工作的本土思想资源研究”(项目号:07SG35)资助]

- ①[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理论的逻辑(第一卷):实证主义、预设与当前的争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2页。
- ②[英]Malcolm Payne《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1页。
- ③⑨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70、35页。
- ④文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十大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 ⑤⑩[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2、43页。
- ⑥⑦[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野》,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426页。
- ⑧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何雪松,1974年生,社会工作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丁惠平)